

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特征 及动力机制

贺艳华 邓凯韶 唐承丽 周国华 范曙光 唐露园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利用 816 份抽样调查问卷，对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目的呈现多样化，以探亲访友、购物、休闲娱乐等为目的的生活性流动比例较大；城乡人口流动频率以 1~3 次/月或者 1~3 次/年为主，城乡人口流动的停留时间以中短期停留为主；由城到乡和由乡到城的双向流动现象明显，但依然以由乡到城的流动为主，城市群内部城乡人口流动的网络化特征开始显现，长沙市区在城乡人口流动网络中的中心节点作用突出；就业性流动的路径变化不大，存在农民工回流现象。另外，文章提出了城乡人口流动动力机制的“四力”模型，认为各种主观因素、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于城乡人口流动决策与行为过程，并产生外在的排斥力和吸引力、内生的能动力和自阻力，影响其流动目的、流动频率、停留时间、流动方向、流动路径等，并在此理论模型基础上对长株潭城市群进行了实证分析。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城乡人口流动；动力机制；长株潭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7)01-0074-08

【DOI】10.15957/j.cnki.jjcll.2017.01.010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人类社会交往过程的体现，也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人口流动的规模和空间格局直接影响着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源的组合分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一直较为活跃，并对区域经济格局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和集聚构成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城乡人口作为城乡相互作用的主体及关键要素流，其流动推动着城乡关系的转型发展与重构。但城乡二元结构主导下的城乡人口流动，以农业剩余人口的空间与产业的暂时性转移为主，并直接表现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乡—城人口流动。随着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正在逐步被打破，人口流动的限制性因素进一步消除，城乡人口的流动日益频繁，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地域，面临着更为紧迫且多元的城乡人口、户籍以及土地制度与政策创新，城乡关系转型较为迅速，城乡要素流动更为频繁，城乡人口流动的新特征也更加明显，并且其城乡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地域空间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复杂。

人口流动一直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目前对于“人口流动”，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往往依据移动的地理边界、离开原居住地时间的长短以及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来区分“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广义上的人口流动是人们为了某种特定目的(如居住、工作、学习、旅行、探亲访友或其他)而永久或暂时地从原居住地流向目的地的行为，它既包括通常所讲的人口迁移流动，也包括人口非迁移流动，既包括半年以上的流动，也包括半年以下的流动。狭义的人口流动则主要指暂时性的流动，不包括改变定居地的、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关于人口流动的研究内容涉及面较广，包括人口流动特征与规律、人口流动格局与影响因素、人口流动动力机制、人口流动效应以及政策措施等方面城乡人口流动主要是指城乡居民在城与乡之间的流动，既包括城市向乡村的流动，也包括乡村向城市的流动。目前学术界关于城乡人口流动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农民城镇化过程与机制以及流动人口与城镇化的关系着手，来研究城乡人口流动特征、趋势及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并探讨其政策建议。从研究方法来看，人口流动模型研究也越来越丰富，马尔科夫链、变量协整方程、辐射模型、多项 logit 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等多种方法被引入，城乡人口流动的复杂网络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但总体而言，更多的关注乡到城的单向流动过程与动力机制，而对于城到乡的流动分析则很少；受人口统计数据的局限，更多地研究了就业推动下的流动人口问题，而非就业性的人口流动则很少涉及；更多地强调了城乡人口流动对城市地区的影响，而其对乡村地区的影响分析却比较少；另外，城市群等特殊重点地区的城乡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也有待加强。

为此，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依托实地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城市群地区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特征及动力机制，以便更好地理解城市群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人口流动之间的互动机制。而本文中所研究的城乡人口流动主要是指城乡居民为了某种特定目的离开原居住地前往城市或乡村滞留、暂住并不时回返的现象，是人们在城与乡之间不改变定居地的移动现象。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是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区位和交通条件较为优越，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的重点培育城市群之一。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的推进，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带动湖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在未来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也将发挥其引领作用。因此，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中部农区典型城市群，作为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地理环境、区域地位以及主体功能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该区域城乡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统计数据获取的可行性以及目前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成效与运行机制，本文主要选择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作为其研究范围。截止到 2015 年末，土地总面积为 2.8 万 km²，常住人口为 1425.65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12548.33 亿元，城镇化率为 67.75%，超出湖南省(50.62%)17.13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4391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95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89，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2.62)。目前，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一体化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城乡人口的流动较为活跃，尤其随着长株潭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城乡居民之间出于购物、休闲、探亲等目的的短期性、日常性流动

日渐加剧。因此，通过对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深入了解其城乡关系演变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为其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从部门人口统计来看，目前关于城乡人口流动方面的数据主要是对流动人口的统计，即常住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该指标更多地反映了以就业为主要目的的中长期流动，而半年以内的以及日常性的流动并未体现，加之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城乡人口流动的目的、方向、频率等信息，本研究主要通过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获取相关数据。2015~2016年间，在长株潭城市群范围内共发放问卷1000份，其中有效问卷816份，其中城市居民417份，乡村居民399份，样本调查区涉及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中心城区，12个县城，以及25个乡镇（图略），样本分布榭盖面广。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市区、县城、乡镇三级城乡人口样本量基本按照各地区人口规模比例进行适度均衡分配。在调查的816个有效样本中，男性为423人，女性为393人，所占总样本量的比例分别为51.84%和48.16%；15~24岁有220人，占比为26.96%，25~44岁有361人，占比为44.24%，45~59岁有180人，占比为22.06%，60岁及以上有55人，占比为6.74%。样本性别与年龄结构较为合理。

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依据调查选项结论进行统计分析，以此总结城乡人口流动特征。为反映城乡人口流动的网络特征，采用了流向与流量分析。流向主要分为城到乡和乡到城，城到乡是指城市居民由城市向乡村的流动，具体到调查样本中体现为从市区或者县城流向乡镇；乡到城是指乡村居民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具体到调查样本中体现为从乡镇流向市区或者县城。除此之外，本文基于城市群地区各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特殊性，尤其是市区与县城之间城市化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城乡人口在市区与县城之间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城镇化推进的地域空间梯度，因此，在进行城乡人口流动网络分析的过程中，对城乡居民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也进行了分析。年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Q = \sum_{i=1}^n f_i \quad (1)$$

式中： n 为调查对象发生流动行为的路径总数； f_i 为第 i 种流动路径的年流动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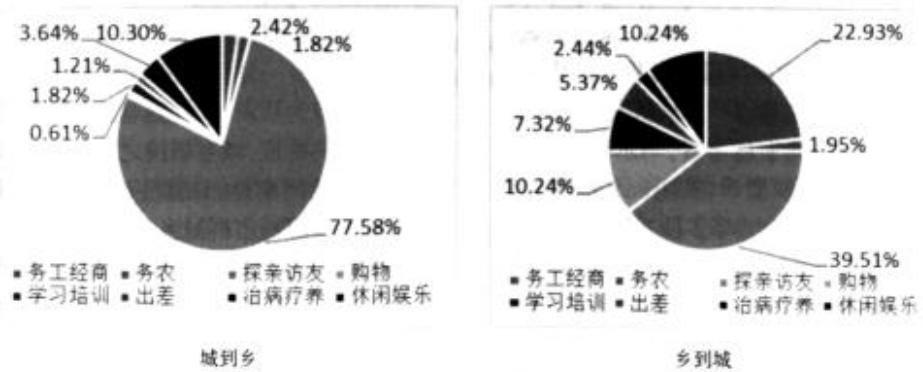


图1 城乡人口流动目的结构分析图
Fig.1 Pie graph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mobility purpose

2 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现状特征

城乡人口流动特征主要可以从流动目的、流动频率、停留时间、流动方向、流量以及流动路径变化等五个方面来进行刻画。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可得，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特征呈现出以下特征。

2.1 流动目的多样化，生活性流动频繁

从流动目的结构分析图（图1）可知，无论是从城到乡还是从乡到城的流动，城乡居民流动的目的均呈现出多样化，包括务工经商、探亲访友、学习培训、治病疗养、购物、休闲娱乐、出差等，其中，探亲访友成为最主要原因，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流动也比较频繁。如果将城乡居民的流动行为分为就业性流动（以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出差为主要目的的流动）与生活性流动（以探亲访友、治病疗养、购物、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流动）两种，在调查对象的流动行为中，就业性流动比例占32.48%，而生活性流动比例达到67.52%。

另外，城到乡和乡到城的流动目的存在一定差别。调查居民由城到乡的流动行为中，以生活性流动为主，以探亲访友为目的的占到77.58%，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占到了10.30%；相比于城—乡的流动目的，乡到城的流动目的更加多元，以探亲访友为目的的占到39.51%，以进城务工经商为目的的占到22.93%，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占到了10.24%，以购物为目的的占到了10.24%，就业性流动比例较城—乡流动要大。由此可见，除探亲访友外，城市经济与产业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对乡村人口流动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而乡村休闲农业的发展正吸引着部分城市居民向乡村流动。

2.2 流动频率适中，以中短期停留为主

根据对城乡居民平时进城或者下乡频率的调查，绘制流动频率雷达图（图2）。由图可知，城乡居民的流动频率多为1~3次/月、4~6次/年、1~3次/年，频率较为适中，频繁流动与无流动者占少数。其中，城到乡的流动频率相对较高，以1~3次/月的最多，其次是4~6次/年；乡到城的流动频率相对稳定，以1

~3 次/年的最多，其次是 1~3 次/月。

城乡人口流动的停留时间则以短期停留为主，调查对象流动行为中停留时间在 1 星期以内（包括 1 天内）的比例占 83.88%，而停留时间在 6 个月以上的比例占 5.01%。乡-城人口的流动中长期停留的比例要高于城-乡人口流动，调查数据显示，城-乡流动停留时间以 1 天往返和 1 星期内为主，半年以上的停留仅占 1.19%；乡-城流动中有 31.48% 的流动人口为 1 天往返，有 25.62% 的流动人口为 1 星期以内，有 12.04% 的流动人口停留时间在半年以上。流动频率的高低与停留时间的长短与流动目的及流动距离有一定关联，生活性流动频率相对较高，停留时间相对较短；近距离流动频率相对较高，停留时间相对较短；反之则反。

2.3 流动网络化特征开始显现，长沙市区的中心节点作用突出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可得，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由城到乡和由乡到城的双向流动特征开始显现，但依然以乡到城的流动为主，城到城的流动也较为频繁，网络化特征开始显现。调查居民的流动行为中，城-乡流动比例为 30.65%，乡-城流动比例 51.98%，城-城流动比例为 17.37%。

通过计算调查样本各个方向上的流 M ，并绘制城乡人口流动网络分析图（图 3），由流 M 数据及网络分析图可得：①乡到城流动可分为县域内部流动和跨县流动，其中跨县流动比例达到了 75.05%，市域内乡村人口向市中心城区的流动明显，比如宁乡县、长沙县至长沙市区，湘乡县至湘潭市区、攸县至株洲市区，并且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之间的跨市域流动也较为频繁，尤其是向长沙市区的流动。②城到乡的流动以市域内的近距离流动为主，流入地以生态休闲旅游型乡镇居多，比如浏阳大围山、望城铜官窑、宁乡灰汤等，其中长沙市区、株洲市区居民向乡村的流动相对较频繁。③城到城的流动主要指县城与市区之间的流动，在三市中心城区中，长沙市区的人口吸纳力最强。

2.4 就业性流动路径变化不大，存在农民工回流现象

根据对长株潭城市群内流动务工人员的调查发现，这部分人群的务工地点相对较为稳定，就业性流动路径的变化并不大。调查对象中有 55.88% 的人群从未改变务工地点，有 36.77% 的人群虽有变化但上一个务工地点仍在长株潭城市群范围内，只有少数人上一工作地点在湖南省内除长株潭以外地区、北上广地区及其他省份地区。这与其择业的原因存在一定关系，这部分人群在择业中更多的考虑到家庭因素，因此选择了就近择业。

对于发生了就业点变化的居民来看，路径变化特征体现在向就业机会更多的长沙市区或株洲、湘潭市区集中。并且，各地均存在劳动力回流现象。另外，通过对其未来改变打工地点的意向调查发现，其中有 84.53% 的调查者暂时没有改变就业地的意向。在其余 15.47% 的可能改变就业地的调查者中，有 23.38% 的人愿意留在长株潭城市群范围内择业，有 41.56% 的人暂时没有决定具体去何地就业，有 35.06% 的流动人口选择了北上广等经济更发达地区。



图3 城乡人口流动网络分析图
Fig.3 The map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mobility network

3 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的动力机制分析

3.1 城乡人口流动影响因素及理论动力模型

根据巴格内 (D. J. Bagné) 提出的“推拉”理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36]。之后，迈德尔 (G. Myrdal)、索瓦尼 (Sovani)、贝斯 (Base)、特里瓦撒 (Trewartha)、李 (E. S. Lee) 等对于该理论模型都作了一些修正，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个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影响因素也逐步被考虑。基于此，本文认为影响城乡人口流动的因素应该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

客观因素主要是指流入地或流出地的自然、社会、经济以及政策制度因素，这些因素由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而对其产生吸引力和排斥力。吸引力是由于流入地气候条件好、工资收入高、就业岗位足、交通条件便利、生活舒适度高、休闲活动丰富、邻里关系融洽、社会治安好等客观环境因素而产生的拉动城乡居民流入并停留的力，排斥力即因流出地相对较差的客观环境因素而产生的推动城乡居民流出的力。

主观因素主要是指流动主体的个人及家庭因素，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到城乡人口流动的行为能力，还会影响到城乡人口对环境的感知能力，从而对其流动行为产生内动力和自阻力。内动力是由于居民自身有利于流动的主观因素而产生的促动城乡居民流动的力，自阻力是由于居民自身不利于流动的主观因素而产生的限制城乡居民流动的力。一般而言，学历程度高、技术能力强、社交广的年轻人对流入地环境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因此其流动行为能力也更强，与此同时，也更容易感受到流入地新环境与新生活所带来的新鲜感与满足感，从而促动其流动行为的发生。

在客观因素作用下的排斥力与吸引力以及主观因素作用下的内动力与自阻力，共同作用于城乡人口流

动的决策与行为过程，从而影响其流动频率与停留时间、流动方向与路径选择等，其理论动力模型如图 4。

3.2 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分析

3.2.1 客观因素分析

结合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特征及其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环境分析可知，目前，经济因素是影响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制度因素、社会因素。由于其地域尺度不大，因自然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城乡人口流动并不明显，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不大。

从经济因素来看，城市群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主导产业以及产业园区建设将直接影响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与收入水平等，从而影响乡一城人口流动方向与流量，尤其是对于就业性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群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的增加，以购物或者休闲娱乐为目的生活性流动频率也随之加大。长株潭城市群自 1997 年推行一体化以来，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2007 年国家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后，其综合经济实力日益加强。尤其是长沙作为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地区的经济集聚与扩散能力越来越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生物制药、文化创意等二、三产业发展迅速，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发区快速成长，从而为乡一城人口流动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高的收入水平，长沙成为了城市群人口流动集聚性最强的城市。其次是株洲、湘潭，两者作为老工业城市，具有其自身的发展优势，因此也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的集聚。由此来看，城乡人口流动的集聚指向与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密切相关。另外，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工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到城乡人口流动的方向与频率。利用软件 SPSS17.0 将调查样本收入水平与流动方向、频率做交叉分析，得到其卡方检验结果见表 1。收入水平与流动方向、频率的卡方和似然比渐进性水平均小于 0.05，即拒绝收入水平与流动方向独立的原假设，表明收入水平与流动方向、频率相关。除此之夕卜，交通条件更是促升城市群内城乡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交通网络的一体化建设也日益完善，长沙、株洲、湘潭之间的时间距离在 1 个小时以内，各市区与县城之间的流动也越来越便捷，这为短期性的、高频率的城乡流动创造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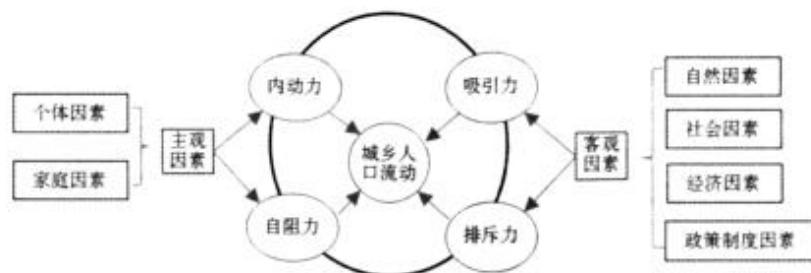


图 4 城乡人口流动动力机制图
Fig.4 The sketch map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mobility mechanism

表1 交叉分析卡方检验值
Tab.1 Cross analysis of Chi-Square Value

| 收入水平与流动方向 | | 收入水平与流动频率 | |
|------------|--------|-------------|--------|
| | 值 | 渐进 Sig.(双侧) | 值 |
| Pearson 卡方 | 49.173 | 0.000 | 78.795 |
| 似然比 | 49.289 | 0.000 | 70.042 |

从政策制度因素来看，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非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是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推行，并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为此，长株潭城市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长沙、国家级湘江新区等，在放宽迁移落户条件、促进土地流转、保障农民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制度改革与政策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为其城乡人口流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3.2.2 主观因素分析

结合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特征与流动主体关系的分析可知，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个体的年龄、学历、情感意识等对流动目的、流动方向以及流动频率的影响较为明显；家庭因素是影响流动距离和停留时间的关键性因素；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文化素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流入地文化的适应能力和融入速度存在差别。

利用调查数据，将年龄、学历分别与流动方向、流动频率做交叉分析，得到卡方检验结果见表2，年龄与流动方向、流动频率以及学历与流动方向、流动频率的卡方和似然比渐进性水平均小于0.05，表明年龄和学历与流动方向和频率相关。并且，分析发现年轻人群体尤其是文化程度高的更加趋向于流向二、三产业较发达的长沙，并表现出转向沿海城市的意向；60岁以上的城乡人口流动频率较低，主要停留时间为1星期以内；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亲情意识相对更强，探亲访友频率较高。另外，对于外出务工的调查对象中，有53.3%是属于整家流动，有18.2%属于夫妻共同流动，整家流动者的返家频率更低，绝大部分是1~3次/年或者4~6次/年。当被问及是否有进城(或下乡)长期居住的计划时，老人大多保留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甚至城市老年人对乡村也表现出了一种向往。

对城乡居民流动过程中的主观印象调查分析，有效地反映了居民对流入地文化的融入速度。调查数据显示，城—乡流动过程中，城市居民对乡村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的占比为59.04%，有47.79%的调查者认为与农村居民相处很融洽，有49.00%调查者认为能较好地习惯乡村的生活工作方式；乡—城流动过程中，乡村居民对城市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的占比为74.43%，有60.67%的调查者认为与城市居民相处很融洽，有60.14%调查者认为能较好地习惯城市的生活工作方式。很明显，由于生活背景以及文化素质的差异，乡村居民反而更容易找到满足感，更容易融入新的环境。另外，学历与适应能力密切相关，对于大专、本科及以上流动人群中，有62.7%认为可以较好地习惯流入地工作生活。

综上所述，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受到各类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长株潭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程度、居民消费能力、交通便捷程度的地域差异以及差别化的政策条件决定了城乡人口流动过程中各地所产生的吸引力与排斥力存在差异，吸引力越大、排斥力越小，城乡人口的流入量越大，流动频率越高，比如长株潭三市市区尤其是长沙市区；反之亦然。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年龄、学历、技术、家庭情况、行为习惯、情感意识的个体差异使得流动主体自身所产生的内动力与自阻力各不相同，内动力越大、自阻力越小，其流动可能性越大、频率越高。不过，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的过程是主客观因素相互影响，吸引力与排斥力、内动力与自阻力共同作用的过程，对于不同的地区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及其所产生的力不同，四力合力的大小决定了流动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及特征。

表2 交叉分析卡方检验值
Tab.2 Cross analysis of Chi-Square Value

| 年龄与流动方向 | | | | 学历与流动方向 | | | |
|------------|--|--------|-------------|------------|--|---------|-------------|
| | | 值 | 渐进 Sig.(双侧) | | | 值 | 渐进 Sig.(双侧) |
| Pearson 卡方 | | 26.546 | 0.000 | Pearson 卡方 | | 115.865 | 0.000 |
| 似然比 | | 25.417 | 0.000 | 似然比 | | 117.558 | 0.000 |
| 年龄与流动频率 | | | | 学历与流动频率 | | | |
| | | 值 | 渐进 Sig.(双侧) | | | 值 | 渐进 Sig.(双侧) |
| Pearson 卡方 | | 73.054 | 0.000 | Pearson 卡方 | | 64.847 | 0.000 |
| 似然比 | | 57.684 | 0.000 | 似然比 | | 50.927 | 0.001 |

4 结论与展望

①收入城乡人口流动是促进城乡关系转型，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群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地域，城乡人口流动特征更加典型。调查样本数据显示，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目的呈现多样化，以探亲访友、购物、休闲娱乐等为目的生活性流动比例加大；城乡流动频率以1~3次/月或者1~3次/年为主，城乡人口流动的停留时间以中短期停留为主；由城到乡和由乡到城的双向流动现象明显，但依然以由乡到城的流动为主，城市群内部城乡人口流动的网络化特征开始显现，长沙市区在城乡人口流动网络中的中心节点作用突出；就业性流动的路径变化不大，存在农民工回流现象。

②收入本文在“推拉”模型基础上，基于主、客观分析视角，提出了城乡人口流动动力机制的“四力”模型。认为影响城乡人口流动的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客观因素主要包括流入地或流出地的气候条件、工资收入、居住环境、交通条件、生活方式、社会治安等自然、社会、经济以及政策制度因素；主观因素主要包括流动主体的年龄、学历、技术、家庭情况、行为习惯、情感意识等个体及家庭因素。各类因素综合作用，并产生外在的排斥力和吸引力、内生的能动力和自阻力，推动或者限制着城乡人口流动过程，从而影响其流动目的、流动频率、停留时间、流动方向、流动路径等。通过对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特征变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以及流动主体特征之间的关联分析，进一步对城乡人口流动动力机制理论模型进行验证。

③收入本文主要依托抽样调查，对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背景下中等发展水平的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但随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全面施行，农民市民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

善，加之农村宅地基政策的改革创新、人地挂钩政策的推行，以及城市群城际快速交通网络的逐步建成，等等，城乡人口流动将面临更加开放且复杂的环境，因此，后续有待围绕这些新因素对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另外，城乡人口流动对城市群城镇化格局的演变、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以及地域空间的组织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特征与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城乡人口流动与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之间的作用机制，可以更好地从“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为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推进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收入侯贺平, 刘绝芳, 李纪伟. 基于改进辐射模型的乡镇人口流动 网络研究[J]. 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 2013, 23(8):107- 115.
- [2] 收入杨传开. 中闻尺度城镇化的人口集聚与动力机制—*于人 口流动的视角[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6.
- [3] 收入李卫民. 城乡关系重构下乡村人口城镇化微进程研究— 基于家庭流动人口的视角[J]. 未来与发展. 2016 (6) :68 - 73.
- [4] 收入孙敬之, 等. 80 年代中国人口变动分析集人口续编[M]. 北 京:中国行政经济出版社, 199%.
- [5] 收入杨彦. 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M]. 武汉: 武汉出 版社, 1994.
- [6] 收入筝胜阻, 简新华. 当代中闻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 武汉:武汉 大学出版社, 2000.
- [7] 收入赵乐东. 新时期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的统计学研究[J]. 经济 经纬. 2005 (6) : 80- 83.
- [8] Bilesha B. Weeraratne. A Microanalysis of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Labour Migration in Sri Lanka[J].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 2015, 4(1) : 72 - 89.
- [9] Basu Mittra Chakma, Asma Akter Akhy. Hill to Plain: Causes and Impac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Bangladesh[J], Sociology Mind, 2015. 5(4): 268 - 275.
- [10] 收入刘盛和, 邓羽, 胡章. 中闻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及空 间分布特征[J]. 地理学报 . 2010, 65(10):1187-1 197.
- [11] 收入 Iain Deas, Stephen Hincks. Migration, Mobility and the Role of European Cities and

Regions in Redistributing Population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4, 22(12): 2 561 – 2 583.

[12] Herman Kok. Migration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side in Hungary and Poland[J]. Geo Journal, 1999. 49(1): 53 – 62.

[13]收入戚伟, 刘盛和, 赵美凤.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及市民化压力分布 格局研究[J]. 经济地理, 2016, 36(5):55-62.

[14]收入马小红, 段成荣, 郭昨. 四类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5): 36-46.

[15]收入李拓, 李斌中国跨地K人口流动的影响因家——基 f 286 个城市曲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J]. 中闻人 1]科学, 2015 (2):73 -83.

[16]收入张權军, 岑俏•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宵际流动影响因素 研究[J]. 人口研究, 2014, 38(5):54 – 71.

[17] 刘涛, 齐元静广忠•中 N 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 镇化效应一一基于 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杏分县数据的分析 [J]•地理学报, 2015, 70(4):567 – 581.

[18]收入朱传耿, 顾朝林, 马荣华, 等. 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索与空 间分布[J]. 地理学报, 2001, 56(5):548 – 559.

[19]收入段平忠. 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 [J]. 中国人口. 资謀与环境, 2011, 18(12): 146– 152.

[20]收入俞宪忠. 人口流动规律及其政策含义[J]. 中闻人口 •资源 4 环境, 2005, 15(1): 120– 124.

[21]李翠霞, 王仕军. 新中闻城乡关系的制度演进历程——以人 口流动为视角的分析[J]. 前沿, 2010(18): 84-86.

[22]收入李炜. 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基于朽岛 市流动人口现状的调奄分析[J]. 宁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2 (5): 61 –71.

[23]收入戎爱萍, 郭卫东. 人口迁移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J]. 经济问题, 2014(8): 122– 125.

[24]收入童潇. 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口流动与社会符理创新——口户 箱制”背软下城乡人口流动管理体制改单和社会政策创新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10) :114– 118.

- [25]收入程遥.健康城镇化竹琪下的流动人口发展拉势与对策[J].经济地理,2012,32(4):25-31.
- [26]收入岳树岭.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 [27]收入耿明斋,等.人口流动、制度壁垒与新型城镇化:基于实地调查的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3.
- [28]收入Williamson J G.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J].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8(1) : 421 - 465.
- [29]齐子翔,吕永强.北京城乡人口流动状态预测研究收入个新方法[J].经济体制改革,2015(2):64 - 69.
- [30]收入华小全.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5):462 - 468.
- [31]收入张锈城市电的昭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32]收入周华,朱翔.罗文章.试论长株潭城市群开发区群体一体化发展[J].城市规划汇刊,2001(3M7) - 50.
- [33]收入贺艳华,周闻华.长株潭城镇密集区范围的界定[J].热带地理.2007,27(6):521 - 525.
- [34]收入周国华,朱翔.肖卓·长株潭城镇职能体系优化研究[J]·经济地理,2001.21(3):324-327.
- [35]收入贺艳华,唐承丽.周国华,等.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快速城市化地区空间冲突测度——以长株潭城市群地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4,29(10):1660-1672.
- [36]收入朱传耿,睐朝林,马荣华,等.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与空间分布[J].地理学报,2001,56(5):549- 559.